



从“四知”到“四为”

钩沉

八百里秦川分东府和西府,有两大碑石一般的名言彪炳史册。一是东府的“四知”,一是西府的“四为”。

“四知”是说东汉时期的荆州刺史杨震,路过冒邑时,冒邑令王密晚上悄悄带了十斤黄金去拜访杨震,杨震当即拒绝了这份重礼,并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假装客气,便说:“暮夜无知者。”杨震听了非常生气,严厉责备王密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说无知?”王密羞得无地自容,只好含愧而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知”典故。

其二就是西府的“四为”。“四为”就是我们今天着重要谈的张载的“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它不仅关学思想精髓所在,也是张载思想的重要精神遗产。

对于此“四为”句,历史上却有版本,一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以及《诸儒鸣道》中的《横渠语录》和明版《张子全书》所载,其文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另一则是清代《宋元学案·横渠学案》所引,文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对于此两种版本,当代学者张岱年的看法是,宋、明各本所载应为张子原文,《宋元学案·横渠学案》所载应是后人修正过的。

对此,我的浅显理解是:首句“为天地立心”,是第一个层面。本来天地是宇宙的客观现象,是自然界的现实存在,虽然它也有生命,但它不是人,没有感情,没有三魂七魄,更没有心。张载在《诗书》中也称“天无心,心都在人。”可见,张载在这里所说的“为天地立心”,其实就是为人立“人心”。张载又说:“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因而,立天地之心,就是要以生物为本,要求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要像先贤圣哲一样,用包容天地万物之胸怀,肩负一种崇高的担当,心承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先贤的学说推而广之,著书立说,实行高台教化,培养和滋润民众的博大仁爱之心,从而达到天人合一。这样才能“为天地立心”,使其“无心”而“有心”。

“为生民立命”,是第二个层面。清代学者把“为生民立道”改成“为生民立命”,我认为也许更符合张子最初

的思想内涵。因为“立命”的命题,在先秦儒家的学说中就有体现,是张载把先秦儒家的学说提升到“道”的一个新的层面。《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认为,一个人从呱呱落地,不管他生命长短,在有限的一生中,如果能修身养性,就可以达到生命长久,更可以安身立命。这里的“立命”指的是个体的人而言,但如何“立命”,除了修身,还应有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一种坚强果敢、勇往直前的强大胸怀,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格魅力。“为”在这里是定义词,指的就是各级政府官吏,都要为生民立命。“生民”,应该指的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各级政府官员,都应该让属下的老百姓“居有屋,食有粮,穿有衣,生有教”,以他们的幸福为幸福,以他们的痛苦为痛苦,勤政爱民,有所作为,在其位谋其政,这样才能达到“为生民立命”的责任担当。

“为往圣继绝学”,是第三个层面。“往圣”,当然张载在这里不仅仅是指儒家学派的孔子孟子,而是泛指诸

子百家的往圣先哲,也就是在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有过重大贡献的先贤哲人。“绝学”,有两层意思,一指独无仅有,如绝唱、绝对、空前绝后等。二指中断了的学说,如断绝、杜绝等。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汉代的学者就认为儒家的道统已经断绝了,因而他们把先圣快要被人们遗忘的绝学的学说继承下来,进而发扬光大。至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六经始成为官方学。此后玄学继起,佛老纷扰,直至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特别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历经百年,一些所谓的文化精英,始而砸烂“孔家店”,继之“废除汉字”,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曾维系我们立国数千年的中华元典,又何止是砸烂,而是打翻在地,还踏上了一只脚。

“为万世开太平”,这是第四层意思,也是张载最高境界的理想追求。“太平”,源出《庄子·天道》,其文曰:“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太平”就是大治的社会环境。庄子生活的时代,在于诸侯征战不休,当时人们渴望和平,渴望国家统一,希望不再有战争发生,不再有任何杀戮,因而庄子便提出了“太平”这一命题,此后也成为从士人到社会大众

普遍追求的美好世界。张载的恩师范仲淹也曾提出过“致太平”思想理念。身怀天下为己任的张载,从辞官回到眉县横渠著书立说,到投徒恢复古礼,实践井田制、修通东西二渠等等,都是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人生追求和社会理想。“为万世开太平”,这里的“为”,从最高层次讲,张载的指向应是指最高统治者。作为一国之主,他们有责任要为万世开太平,为后世子孙开创出没有战乱,没有灾荒,没有衣不裹体,食不果腹的太平基业。

总而言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分别强调了人与天地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个体人的心灵修养的诸多关系,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社会属性的每一个自然人的经世用世的抱负和理想。

所以,我们今天纪念张载诞辰1000周年,就应把这四句话赋予新的思想内涵,来规范我们的言,来规范我们的行,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同时,更应怀着对天地生民的敬畏、对万世太平的向往、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进一步弘扬张载经世致用的政治主张,崇圣贵德、崇德信、崇道、崇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责任担当。 □王盛华

事关王阳明的文坛公案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留下了许多浪花晶莹的文坛公案。众多公案或因作品争鸣、名家异议或人事纷争,都有公论,留下美谈。然而,涉及王阳明的“金山对诗”公案,虽流传久远,却无人论定,以至今日仍悬而未决。

今日细读《王阳明全集》《读懂王阳明》《王阳明年谱》等书,经过认真比对、甄别,从分散各处的支离片语中理出其叙而不议、述而不评的两大理由:

其一,记录者无权发声与判断。王阳明在“金山对诗”活动中的诗作,既未由在场人士及活动组织者收集、整理、留存、刻印、发行,也没被自己留于文稿,只是口碑。起初由其本人和其爷爷王天叙等当事人传为趣谈,后于民间传为美谈,如此这般,逐步传为只有人议及、而无人评定的文坛公案。他在世时或去世后,为他整理的《传习录》及杂著者,均为他的门生,作为后学,对师长的作品、事项便只宜记、不宜议,更不宜评说与论争了。

其二,事主的心学盛名掩盖了文名。王阳明虽诗文有名,但中年之后靠其影响深远的“阳明心学”名振华夏。后世尊其宗师,盛名广传至今,已历五百余年,学说播及世界多国。作为圣人的王阳明身世,实在是哲学压了文学。于是,多个版本的《阳明全集》,只有其学成为官后的哲学著述及有原始刻本可供收录无异议的诗文杂著,而无“金山对诗”作品。《王阳明传》等后世记著,对此事大

多无记,凡记录者也只是三言两语式的提及。略为详者,只是其门生、爱徒钱德洪编著的《王阳明年谱》。他对多数年份只记一两事,多数事项只记一两句,但对此事倾心,不仅记叙了事件过程,而且录入了诗作。原文如下:

“龙山公迎养竹轩翁,因携先生如京师,先生年才十一。翁过金山寺,与客酒酣,拟赋诗,未成。先生从傍赋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纱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大惊异,复命赋金山房诗。先生随口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圆。’”

历史长河所留如此这般的文史记录,明显告诉我们:史上公推的王阳明著述,既偏哲学轻文学,又因不便担责而重视王阳明的亲笔原著,忽视其口传文学作品。故而,“金山对诗”作品未入其文集,记载只略见于他人著述。因此,“龙场悟道”及“四句教喻”等哲学论题被人追捧五百年、研学五百年、争论五百年、传扬五百年,而所谓“金山对诗”公案却少有人论、鲜为人知。

如果上述理由成立的话,我们对“金山对诗”这一文坛公案,便只能给这样一结论:这是与思想巨匠、心学宗师王阳明永远相伴的一则哲坛花絮、文坛佳话,而无所谓“文坛公案”。

那么,“金山对诗”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学活动呢?

当我们穿透王阳明成年、成才、成官、成名、成家及成为大儒的心学宗师光环,阅其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思想家的众多著述与记录,通过研析《阅读王阳明》等传记,对照《王阳明年谱》等史记,便能回到其单纯的童年,便可用看待一个纯贞童子的正常目光来看此事。于是,此事便显得相当正常。

现在,让我们用白话文,来简述式还原“金山对诗”场景:

时在1842年,王阳明年方11岁,被爷爷王天叙(号竹轩)领着,离开家乡余姚,赶赴京城,去与头年因考进士、中状元而进京为官的父亲王华(字听辉,别号实庵,又称龙山公)同住。此去重要目的,一为王华接王天叙京城养老,二为王天叙携爱孙投学,他想借此机会为王阳明改善学习条件,以优异成绩考取功名。行至镇江府,当地文友招待王天叙,邀于扬江边的金山寺景区游玩、聚餐。酒足饭饱,余兴未尽,有人提议对诗作乐,且以名景金山为题。文友相对,谁也不甘落后,自是要精推细敲一番。然而,大人还在苦思冥想,小孩却已出口成章。见王阳明摇头晃脑地对景吟诗,众人惊而议、而笑、笑而问:此诗是爷爷吟,还是爷爷提前做好而让孙儿现场背诵的呢?无论咋问,对自己、对孙儿都是不公的。因此,王天叙提议另题再对。有人指着侧面的另一景观,给出了“蔽月山房”的题名。众人叫好,开始了搜肠刮肚的又一轮斗诗。然而,这一战



王阳明

局,又让王阳明抢先制胜。当一伙镇江名士还在对景研析,王阳明只是看一眼静悄悄的景物,扫一眼乱纷纷的人物,便移步成诗。当他以清脆的童音优雅吟出,众人只好点头,无言争议。于是,一场带着酒气与才气的文人游戏,就这样因这位童子的一诗定音而草草收场。

此事虽当下无争无疑,也无胜负定论。但事后在其爷爷等人的宣传之下迅即传扬,且从镇江、余姚及各地,以至王阳明未进京,其“神童”与“诗童”等美名已传至京都,从而给中国文坛留下一则诗话趣事,给中国民间留下一则“文坛公案”。 □李焕龙

人物春秋



三层龙头地车轱辘灯。

地车轱辘灯的前世今生

恶性循环。1855-1857年,蝗来“飞蔽天日,集田害稼”“食禾尽,民大饥”“飞蝗蔽空,米价昂,讹言四起”。百姓饥肠辘辘,只得逃难逃荒。

同治元年至光绪六年(1862-1880年)间,陕西关中地区始终战乱不休,灾害迭生,导致人口锐减,“满目蓬蒿惨然,堪怜沃壤变荒田。”土地荒芜,人烟稀少,野狼出没为害,百业凋零不堪,其中以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关中地区下降最为明显。正因如此,这里地广人稀,成为了外来移民的乐园。

时在陕西任职的山东籍官员焦云龙,目睹家乡人民颠沛流离的苦痛,又深感陕西三原及关中渭北各县土地大量荒芜置之憾,便写条折上奏陕西巡抚,议将山东灾民批量迁往关中,在得到允诺后,亲赴青州各地动员。为了激发流民的迁移动力,焦云龙还用当地的顺口溜,来描绘关中的富庶:三原、临潼县一带是“包子山,馍馍岭,哟哟吃香油用手捧”;三原县是“闲地多,顿顿花卷白馍馍。”光绪九年(1883年),他又借父亲去世回乡奔丧之机,动员胞弟、舅父、岳父等亲属举家迁陕。

山东移民举家西来,山高水远,日夜兼程,缺乏照明之物,就用木头做一个夹子,中置木轴,穿竖立圆轮,上紧挨放一平板,内放油碗,灯芯,用河边柳条或破荆条折成灯架,外用纸糊一灯罩,夜里点着,让孩子推着在前边照明引路。这就是最原始的地车轱辘灯。

日子慢慢好转,生活渐渐富足,正月十五闹花灯,安居在三原县渠岸镇的山东人,就想起了大迁徙途中的地车轱辘灯,做出来让娃娃玩,既是纪念又是娱乐。随着时代的推进,做灯的柳条、荆条,换成了细细的竹篾子,内置的油灯换成了蜡烛,外糊的白纸上也画上了各种图案。玩地车轱辘灯的村庄也开始发酵,从董家窑(原叫义和村),传到黄毛村。黄毛村的老人梁彦伦,就是从小到董家窑边玩边学的。

解放初,黄毛村的地车轱辘灯,表演形式多样:圆场、交叉、列队……还受邀赴咸阳、渭南表演。为了丰富多彩,表演时还加入了歌队、五人旱船、高跷等民间娱乐活动。

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只有个别人家过年时,才给娃娃做地车轱辘灯。而今,黄毛村为了让地车轱辘灯重现风采,请会做灯的83岁老人梁彦伦、高庆山和72岁的张云亮耗时40余天,做成地车轱辘灯13个。灯形由原来的简陋单灯,变成石榴形、花瓶形、宝塔形等三层三层灯;每层灯下,都有可以转动的轱辘;外糊的白纸,变成了五彩丝绸;每盏灯上,都粘有一圈流苏,车转动起来,流苏飘飘,七彩夺目;灯顶插置各种绢花,鲜艳绚丽;原来木竹制作的灯杆,已经被塑料管子取代,美观轻巧;灯杆顶端,插入木雕的龙头凤冠,

喻示喜庆祥和;灯内的蜡烛已经换成电灯泡,灯下底座拐角装置电瓶,上面巧用绿叶覆盖,扶杆上安有开关,可以让灯随时明灭。正式表演时,用山东鼓调敲打锣鼓,地车轱辘灯出场时,前边有一挑担子的人,引领玩灯的小青年圆场、交叉、列队……挑担人走时走停,走时步移串花,停时即兴即兴说唱。

地车轱辘灯全部手工制作,特别是雕刻龙凤,难度颇大,耄耋老人梁彦伦等人向他们带的三个徒弟传授地车轱辘灯的做法,使这一形式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承下去。

黄毛村的地车轱辘灯,文化深厚、历史悠久。曾应邀参加中国第十一届艺术节表演。央视7套、11套专栏节目,先后多次到三原,以城隍庙内古建筑为背景,拍摄地车轱辘灯,并在春节期间进行了多次播出。 □吴树民



代表陕西参加中国第十一届艺术节。

不是『碧血』是『热血』

某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上,中国京剧舞台上四位一线名家于魁智、李胜素、孟广禄、赵葆秀共同演唱的京剧《我是中国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那声腔、韵味、气势,那感染力和穿透力,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该歌词总体呈现出雄壮磅礴之气,且看其全貌——

我是中国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满腔碧血映丹心。家有诗书如沧海,铁打的双肩两昆仑。

我是中国人,历经劫难不殒身。生离死别寻常事,百代忠良报国恩。

中国人,同是华夏好子孙,中国人,海角天涯一条根。中国人,神州共济千秋业,壮志无愧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梅花品德日月魂。千红万紫随风去,唯有玉壶照冰心。

我是中国人,浩然正气满乾坤。自信生来有傲骨,不在人前矮三分。

中国人,同是华夏好子孙,中国人,海角天涯一条根。我和你欣逢盛世担大任,做一个坦坦荡荡、磊磊落落、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这样的歌词,读了教人张直气而扶壮心,美之如白璧。然而璧中有微瑕。那就是第一段歌词中,“碧血”用错了,当用“热血”。“碧血”一词,典出《庄子·外物》:“苾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为碧。”《庄子·外物》疏云:“碧,玉也。苾弘遭害,被放归蜀,自恨志而遭害,遂割肠而死。蜀人哀之,以匿盛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玉。”《辞源》解释此典时谓:后常以“碧血”与“丹心”连举,称颂为国殉难的人。

古时,“碧血”的用法是如此。元代郑元佑《张御史死节歌》中有云:“孤忠既足明丹心,三年犹化碧血。”京剧《杨门女将》余太君的唱词中,有言及金沙滩杨老令公和四个儿子为国而死的情节,有两句唱词就是“父子们壮志未酬疆场饮恨,洒碧血染黄沙浩气长存。”

回过头来再看《我是中国人》的歌词,第一段中,“顶天立地”的大我,是志士,是勇士,是大活人,而不是有阴阳之隔的为正义事业捐躯的殉难者,故而“碧血”用错。细味此歌词,这里的“碧血”当为“热血”。“热血”,《辞海》解释为:“比喻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如满腔热血、热血沸腾,就是这种用法。《国际歌》中唱道:“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其中的“热血”说的也是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精神。以“热血”取代“碧血”,解此《我是中国人》歌词,非但文从字顺,其义尤佳。 □杨乾坤

语林指瑕

有学者对二十四节气排序方法提出疑问,表示以春季立春为首,以大寒为尾的排序方法错误,应当以冬季的冬至为首,以大寒为尾。那么以冬至为二十四节气之首的排序是否正确呢?

河南省登封市二十四节气代表性传承人吕宏军说:“出现以冬至为二十四节气之首的说法,源自《淮南子》等书的记载。《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节日是冬至。”究竟二十四节气应以“立春”为首,还是以“冬至”为首呢?这决定于对四季节气的划分方法及其功用。

已知划分方法计有五种,即天文划分法、气象划分法、古代划分法、农历划分法和气候统计法。其中历史上多采用的划分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天文划分法,即以白昼最长、太阳最高为夏季,以白昼最短、太阳最低为冬季,冬夏两季的过渡季为春秋。天文的分类法主要是标注太阳的位置及昼夜长短的,其意义在于天文科学方面。第二种为古代划分法,就是以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来划分,即自古至今通用的四季分类法。这个分类法是以立春(黄经315度)为春季开始,至谷雨结束;以立夏(黄经45度)为夏季开始,至大暑结束;以立秋(黄经135度)为秋季开始,至霜降结束;以立冬(黄经165度)为冬季开始,至大寒结束。

这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智慧的古人早已发现和思考,并总结出了二十四节气与四季轮回和生产生活更应时顺景的排序,即把立春排序为二十四节气第一个节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古代划分法。这样排序后,立春一般在农历春节前后,有时还会与除夕和春节重合。 □王胜昔

『立春』『冬至』谁才是二十四节气之首

正月十五夜,在关中三原县渠岸镇黄毛村,就有一种新鲜的社火表演即将开始。热心的观众如洪水汇聚,正在人们发愁场地太小难以施展的时候,只见一个头扎英雄结的小伙,手持流星锤(烧红的柴炭装在一个拳头大的铁纱网里,系于细铁链或绳索一端)抡着闯入人群,看到流星锤飞舞,火星四处飞溅,人们本能地后退,让出了场地。这时,随着铿锵铿锵的锣鼓声,四个青年各手持牌灯站立四角,然后二十个打扮得俏丽的娃娃,身着节日盛装上场,他们手里推的,就是人们期盼的地车轱辘灯。

地车轱辘灯,是山东移民迁陕路上的一大创造。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堤,汹涌的黄河水引起黄河改道,山东全省五府二十余州县受灾,水灾过后,旱蝗肆虐,